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5.2

一年出版4期，以15种语言刊出

美国社会学的危机

Ivan Szelenyi

全球社会学？

Gurminder Bhambra

我们想要的未来

Markus S. Schulz

查理周刊事件之后

Stéphane Beaud,
Mabel Berezin,
Elisabeth Becker

全球论坛

- > 巴基斯坦的社会学
- > 纪念Ulrich Beck
- > 爱尔兰的社会学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5卷/ 第2期/ 2015. 6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编的话

社会学的未来和未来的社会学

这期全球对话展开了新的系列文章：社会学的未来。著名的匈牙利社会学家 Ivan Szelenyi 提出了美国社会学面临三重危机的观点：政治危机、方法危机、理论危机。美国社会学已经失去了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到达巅峰的政治上的召唤能力，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失去优势，没办法和政治学与经济学中流行的田野实验与因果分析并驾齐驱，此外也失去了理论的想象力，与古典社会学脱钩。他指出，美国社会学越来越不受到学生欢迎，这是真的吗？

英国的 Gurminder Bhambra 批判社会学不成比例地把重点放在全球北方，例如 Szelenyi 的研究，但也批判本土社会学、全球世界主义、现代化理论，因为其以欧中作为中心出发，作为其他地方的参考基准。这些观点没有办法达到她所提出的全球社会学任务：透过连结去重新找回殖民和后殖民的经验。然而，全球社会学可以没有南方的参与吗？另外两位从巴基斯坦来的社会学家 Laila Bushra 和 Hassan Javid 描述了许多南方国家的社会学所面临的困难，遑论全球社会学。这是真实的，即使巴基斯坦有着国家层级的社会学会和 19 位 ISA 的会员。

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南方在北方的深化。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Stéphane Beaud 描述了法国社会学家的辩论，而 Mabel Berezin 说明了欧洲右翼政治的转变。Elisabeth Becker 则以她在德国、西班牙、英国的田野经验，说明了在穆斯林社群蔓延的恐惧。

ISA 的研究副会长 Markus Schulz 讨论了从社会学的未来到未来社会学，这是 2016 年 7 月 10-14 日在 Vienna 举办的 ISA Forum 的主题。他从说明诊断未来的重要性开始，并且警示了危险的到来。未来掌握在人类手中，社会学则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Schulz 的视野是被 Ulrich Beck 所启发的。Ulrich Beck 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去世，这是全球社会学社群的损失。他是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家，启发无数的人，并且超越了学科疆界。这期全球对话也从德国、阿根廷、南韩、加拿大的学者的角度撰文纪念 Ulrich Beck。

最后，我们继续了我们各个国家社会学的系列文章。这期是爱尔兰。有四篇文章描述了爱尔兰的全球转变：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复兴的公共领域，爱尔兰家庭的全球化，以及欧洲对爱尔兰女性运动的支持的启示。



Ivan Szelenyi 是杰出的匈牙利社会学家，以自身经验出发，讨论美国社会学的衰落。



Gurminder Bhambra 是英国的著名社会学家，批判全球社会学的传统取径，提出「连结社会学」的理论。



Markus Schulz 是 ISA 的研究副会长。他介绍了 2016 年 7 月 10-14 日在 Vienna 举办的 ISA Forum 的主题：我们想要的未来—全球社会学与迈向更好的未来。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出版社提供赞助。

全球对话以 15 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http://isa-web.org)。

投稿请寄给 burawoy@berkeley.edu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Gay Seidman.

副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Benno Alves.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shmi Jain, Pragya Sharma, Jyoti Sidan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itra Daneshvar, Faezeh Khajehzadeh.

日本:
Satomi Yamamoto, Hikari Kubota, Hatsuna Kurosawa, Masahiro Matsuda, Yuka Mitani, Ayaka Ogura, Hirotaka Omatsu, Fuma Sekiguchi.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Gulim Dosanova, Daurenbek Kuleimenov, Elmira Otar, Ramazan Salykzhanov, Adil Rodionov, Nurlan Baygaby, Gani Madi, Anar Bilimbayeva, Galimzhanova Zhulduz.

波兰:
Adam Müller, Anna Wandzel, Jakub Barszczewski, Justyna Kościńska, Justyna Zielińska, Kamil Lipiń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Mariusz Finkielstajn, Martyna Maciuch, Mikołaj Mierzejewski, Patrycja Pendrakowska, Weronika Gawarska, Zofia Penza.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ș, Corina Brăgaru, Andreea Acasandre, Ramona Cantaragiu, Alexandru Dutu, Ruxandra Iordache, Mihai-Bogdan Marian, Angelica Marinescu, Anca Mihai, Monica Nădrag, Balazs Telegdy, Elisabeta Toma, Elena Tudor.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Nil Mit, Rana Çavuşoğlu.

媒体顾问: Gustavo Taniguti, José Reguera.

编辑顾问: Ana Villarreal.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社会学的未来和未来的社会学	2
美国社会学的三重危机 by Ivan Szelenyi, 匈牙利	4
全球社会学？ by Gurminder Bhambra, 英国	8
我们想要的未来 by Markus Schulz, 美国	11

> 查理周刊事件过后

法国社会学家辩论查理周刊事件 by Stéphane Beaud, 法国	13
查理周刊事件之后的极端主义政治 by Mabel Berezin, 美国	16
田野笔记：在欧洲体验恐惧 by Elisabeth Becker, 德国	19

> 巴基斯坦社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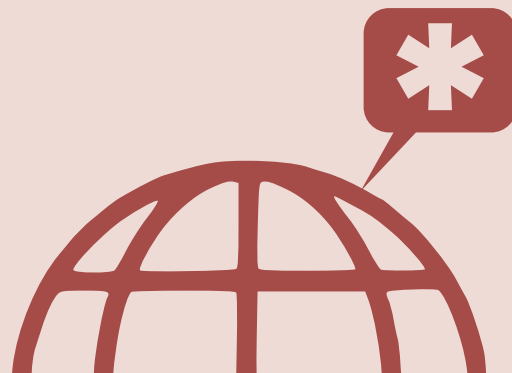
搜寻巴基斯坦社会学 by Laila Bushra, 巴基斯坦	22
巴基斯坦社会学的展望 by Hassan Javid, 巴基斯坦	24

> 纪念Ulrich Beck

Ulrich Beck: 来自欧洲的世界主义社会学家 by Klaus Dörre, 德国	26
Ulrich Beck在拉丁美洲 by Ana María Vara, 阿根廷	28
Ulrich Beck在东亚的影响 by Sang-Jin Han, 南韩	30
Ulrich Beck在北美的多重影响 by Fuyuki Kurasawa, 加拿大	32

> 爱尔兰社会学

爱尔兰的经济危机 by Seán Ó Riain, 爱尔兰	34
保卫公共领域 by Mary P. Corcoran, 爱尔兰	36
爱尔兰的女性运动 by Pauline Cullen, 爱尔兰	38
Celtic连结：爱尔兰的全球家庭 by Rebecca Chiyoko King-O'Riain, 爱尔兰	40



> 美国社会学的危机

by Ivan Szelenyi, New York University, 美国



45年前，Alvin Gouldner 在《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一书中，预测了 Parsons 结构功能论的消失，以及反身社会学的兴起。这在 1970 年代看起来是刚好相反。因为 1970 年代 Parsonse 过世之后，社会学进入了最令人兴奋的阶段。而和 Gouldner 站在同一阵线的其他社会学家像是 Seymour Martin Lipset, C. Wright Mills, S.M. Miller, Lee Rainwater, Pierre Bourdieu, David Lockwood, Ralph Miliband, Claus Offe, Ralf Dahrendorf, 还有来自当时社会主义东欧的 Praxis 学派，都是批判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很讽刺的，Gouldner 的预言好像不成立了，因为这个学科已经摆脱了结构功能论，找到了出路。这曾经是拥有无聊概念、无法验证的学科，变成了政治和知识上令人兴奋的课程。

Ivan Szelenyi.

Ivan Szelenyi 是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把社会学应到我们这个时代重要问题上面。他从 1960 年从匈牙利开始其职业生涯，一开始在匈牙利统计局和在科学院里面工作，由于其批判的角度，最后被迫离开。批判的作品包括了和 George Konrad 合作的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1979)，是研究东欧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后来他到奥地利的 Flinders University 的社会系教书，后来又在美国，是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Graduate Center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和 Yale University 等学校的的讲座教授。最近他是 New York University 之 Abu Dhabi Campus 的社会科学院院长。他的研究包括了国家社会主义下的市场分配机制以及社会主义资本家的轨迹，至今仍然是相当有原创性的。他是少数几位结合历史与比较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市场转型的学者之一，与其学生 Gil Eyal 和 Eleanor Townsley 等合着了《*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他出版了许多包括研究后共产匈牙利的精英和穷人，也桃李满天下，并且其社会理论的历史课程相当受欢迎。很少人可以像他从美国内部和外部的角度评价美国社会学。



可是到了今天，Gouldner 的预言看起来又格外正确，因为社会科学已经产生了根本的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实验方法等取得了胜利。社会学家仍然寻找怎么响应这个潮流。现在的学生比较保守，担心就业和退休金，并且对激进理论丧失了兴趣。社会学系没有办法吸引足够的学生去主修，只好提供轻薄短小的课程，好增加修课人数。[1]

社会学似乎面临了三个危机。第一，社会学已经失去了其政治上的吸引力和激进的面向。第二，社会学还没有找到对于从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而来的方法论挑战的适当响应。第三，社会学似乎在理论的核心这点上面让人困惑（例如，什么是社会学的经典书籍），甚至这样的核心是否需要都成问题。

> 政治危机

四十年前，社会学是一个可以吸引激进老师和学生的学科，对于那些有兴趣于改革甚至革命的人，社会学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而 19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社会学家通常比较保守，而学生都比较激进。

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我们有激进的老师，可是学生好像是「年轻共和党人」。如果你支持共和党，为什么你会主修社会学而非经济学或理性主义政治学呢？而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能找到足够的座位给学

生修课，而是不能找到足够的学生来开课。

这就是我称的「政治危机」：我们不能吸引学生，而社会学也不能提供社会改革有志之士愿景。

> 方法论危机

但是社会学的危机反应了「方法论革命」。像是 Comte 所说的，期坚持「社会的科学」必须包括和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严谨度，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想要证成自己是「科学」，所以在「变量」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而社会科学家可能找到因果关系吗？韦伯很怀疑不能，但也提出「诠释社会科学」。而社会学因为调查方法和随机抽样（用几百人的样本来预测几百万人的选举结果）有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我们距离真正的因果关系还很遥远。

要验证因果关系，我们必须把部份的人归类成「实验组」，让这些人接受否些「治疗」，而其他是控制组，则没有接受治疗。

而和实验相反的是，调查研究不可避免会面临「选择问题」，无法分辨 A 和 B 两群人的差异是本来就有或是因为接受治疗而产生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我们知道结婚的人活比较久，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因为婚姻，或是健康的人比较可能结婚呢？如果

我们可以把某些 40 岁的人道实验组，其他到控制组，实验组可以结婚，控制组则不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因果关系。可是这样的随机分配显然不可行。

社会研究者已经开始要走出这个泥沼，试着去找出「因果机制」，说明 x 可能如何导致 y 。例如，结婚者饮食规律，较少饮酒，可能活得比较久。这是很大的进步，我也在我们研究中尝试了很多次，可是对于「常态科学家」来说，这行不太通。调查研究者试过了其他方法，不过都没有解决选择问题。

有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使用实验。实验若有着控制的环境，那么随机分配就可以得到解决，可是成本太高了，还有外部正确性的问题，就是是否实验结果可以应用到实验室以外。这个方法也没有真正的随机样本，所以无法有普遍的理论，因为受试者都是中产阶级大学生（另外的方法是田野实验，随机选择可以成立，可是随机分类则无法进行）。

然而，经济学和政治学提供了一套解决因果关系的方法论（虽然我提到经验上的问题），社会学则处于防卫立场。所以，产生了方法论危机。

> 理论危机

社会学并没有产出比较好的理论。从 1980 年之后，理论就一直衰退。我不是对于 Merton-Parsons 的理论有多愁，结构功能论后来被健康的理论对话所取代，主要是 Marx 和 Weber，但也有其他理论的空间，像是象征互动论和民族志方法。

我必须承认，即使在 60 和 70 的黄金年代，社会学家也在辩论什么样的作品必须纳入社会学理论课程。现在共识可不可能，特别是为了保持一定的组成，社会学试着去吸引跨学科领域，像是女性研究、黑人研究、亚裔研究、墨西哥裔研究，文化研究等等，这些都是有正当性的，可是却会模糊了社会学的学科界线。

和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比较是有用的。经济学家对于其理论的基础是有共识的。我所认识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为什么学生应该修总总体和个体经济学。不过对于课程内容比较弹性的空间。可是课程大纲非常标准化，任何的经济学博士都可以教这门课。不过对

于古典理论的忽略是值得一提的，这意谓着学生很少辩论那些长期以来的争议议题。古典理论争议有可能会回到这个学科，就像是 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时的 Marx 和 Keynes 一样。

相反的，许多社会学系所对于导论课程并没有共识，所以提供了许多课程，理论和认识论都大不相同的课程，或是提供像是色拉搬的导论课程，把几个 sexy 的主题混合在一起，搭配一些电话簿目录般的无聊基本概念。经济学的模式比较好，或是社会学呢？我会回到这个问题，但是看得出来经济学巩固了学科，社会学则有点混乱。

更让人困扰的是，社会学家对于经典有没共识，所以对于什么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也没有共识。社会学可能对于什么样的问题是属于社会学家的有些轮廓，像是不平等、教育和职业取得、社会流动。现在我们不但很难指出我们的研究问题是什么，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甚至对上述这些问题也有很好的研究。我想社会学家对于现在最重要研究不平等的书籍是由经济学家像是 Thomas Piketty 或 Joseph Stiglitz 所写的感到惭愧了吧。

> 危机的出路？

让我讨论社会学方法的优点来结论这篇文章，并且呼吁那些想要模仿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社会学家们，这么做是有危险的。

社会学的优点是反身性。从 Marx（“统治阶级的思想存在於每一个统治的思想裡”）到 Mannheim（“意见、宣称、反对、思想系统，都是从表达者的角度所诠释的”）以及 Alvin Gouldner（《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这些社会学家都问谁是言说者，而什么样的角色是社会学家扮演的？只要社会学家寻找无言者的声音，他们就会找到其支持者。

是的，现在的学生或许比较保守，可是 2008-2009 年之后以已经产生了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满。当社会学回到阶级、种族、性别、权力、贫穷、压迫、剥削、偏见的问题，社会学的荣景将会再次出现。Michael Burawoy 的公共社会学呼吁就

是这样的召唤，而且他的社会学系在这点上相当杰出，教室总是作满，并且有着最好的研究生。若社会学秉着政治的任务，其会重新夺回被经济学所主导的大问题，也会找回 Marx 或 Weber 的批判社会学传统。

对于方法论的危机，许多社会学家的解决方式是把社会学变成常态科学，便得更像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公式化人类行为，而不是逼近社会现实。但是我已经指出，实验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验证因果假设，可是其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所面临科学预测的问题是没有帮助的。

在 NYU 的 Abu Dhabi 的教授 seminar 中，我们问了一个问题：经济学是科学吗？我的从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来的同事 Gilles Saint-Paul 说的好：若数据有缺点，而模型又不能被否定，那经济学怎么可能是科学？Gilles 建议，应该把经济学看成是一种文化活动，提供辩论的框架，而非可否证的假设。

我承认我觉得「为什么」的问题比「如何」的问题还要有意义，而且我也觉得无法否定问题不是好的研究。可是像是 Weber 发明了「客观性」一词，我会把社会科学看成是复数的科学。若科学代表因果关系的可验证性，这点上，没有什么社会科学是科学。从 Hobbes 和 Parsons 的观点来说，社会行动是自愿性的，而 agent 是可以做选择的。像是 Marx 也精确观察到「人类创造历史，但是也被过去所影响。」人们做出选择，而且选择是统计性的，不是决定性的。Weber 说得好：我们可以诠释性动，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分辨什么行动是理性的，也没办法预测下一个行动。

从这个意义来说，诠释社会学是优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而社会学家也在模仿经济学和政治学这点上犯了错误。

社会学还有另外一个优点，那就是社会学家用反身性来解读数据。对于质化研究者来说更是如此。Howard Becker 所训练出来的民族志学者最了解这点：一个人必须完全进入一个社会情境中才可以知道什么是可以问的社会学问题。细心的田野研究者和调查学者可以告诉我们对于社会

现实该有多么细心。

社会学若是接受自己是一种科学（小写）而非大写的科学，那么社会学会更好。是的，我们应该问「为什么」，但是还是要对于我们的答案抱持怀疑的态度。从这个观点来说，经济和政治学若从社会学学习这点的话，他们也会变得更好。

所以底限是什么呢？社会学的确有三重危机，对于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学派的科学的挑战有着错误的响应，不是模仿他们，就是赶搭潮流，变得跨学科却失去原本的支持者。

然而，我建议回到古典的 Marx 或是 Weber 的传统，也就是探索大问题的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或许认为自己是科学，但是社会学若是也模仿他们，变成另外一个常态科学，那会变得很愚蠢。当社会学问大问题，使用反身性，诠释的方法，那么这才会对经济学和政治学有所挑战。一个左倾、批判的新古典社会学，何尝不可？■

来信寄给 Ivan Szelenyi <ivan.szelenyi@nyu.edu>

[注 1]：我想大家会同意在 1965 年和 1975 年的社会学学生有跳跃性的成长，但是 1980 年快速减少。(David Fabianic, "Declining Enrollments of Sociology Major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Spring 1991: Bronwen Lichtenstein, "Is US Sociology in Decline?" *Global Dialogue* 3.2, and http://www.asanet.org/research/stats/degrees/degrees_level.cfm)。虽然学位人数一直在增加，可是相较于 1970 年代的高峰，人数还是相对少的。

> 全球社会学？

by Gurminder K. Bhambra, University of Warwick, 英国,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Conceptual and Terminological Analysis (RC35) 内部委员



| Gurminder Bhambra.

全球社会学已经被提出来作为处理之前被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所排除的那些被忽略的议题。这也被用来讨论迈向新的全球社会学框架。这个新的全球社会学关怀三个面向：第一，这是多重现代性的典范转移。第二，这是对于多元文化全球社会学的呼吁。第三，这是支持全球世界主义的论证。虽然这些论点考虑到了非西方的全球，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够的。

相反的，我论证「连结社会学」取径去重构一个后殖民和去殖民的欧洲中心主义批判，这可以作为理解全球现在更好的框架。连结社会学的中心关怀是重新思考社会学，把重置、殖民、奴役的历史放回社会学中心。只有承认殖民的全球历史，社会学才可以理解现在的后殖民和去殖民情境，一个批判的全球社会学才有可能。

社会学和现代性是相互构成了，一起随着现代事件的浮现而出现，也和经济与政治的革命有关，需要一个新的解释框架。随着这样的理解的浮现，也就是把现代归因给欧洲，世界的其他地方则变成了这个历史过程的他者。殖民连结和过程被认为是现代性中不重要的，也是现代性的压迫或是去形成化。虽然这些革命的历史叙事和现代性本身也随着时间变，但是整个历史的框架--自主的内生根源和全球的传布--还是继续再生产。即使很多人呼吁一个新的全球社会学，但是还是没什么改变。

Gurminder K. Bhambra 是后殖民社会学的重要学者。她处理了社会学的在地偏见问题，指出殖民经验和贡献如何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其最新的书《Connected Sociologies》(2014) 论证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社会学取径之不足，因为其把非欧洲的他者忽视了。她也关心非裔美国社会学的边缘化，并且指出当代的公民身份概念怎么忽略了其历史不为人知的一面，也就是殖民和奴役的历史。她也是新书系《Theory for a Global Age》的编辑。

>多重现代性

多重现代性在90年代把现代化理论置换成不同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议程。现代化理论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和依赖理论所批评。为了为多重现代性论证,学者避免了两个错误。第一,就是只有一个现代性这样的观点(西方现代性汇聚收敛)。第二,从西方看东方的西方中心主义。这些学者论证,虽然批评现代化理论是欧洲中心主义,多元现代性还是以西方为参照点来检视其他另类现代性。从这个方式来看,他们反而透过承认欧洲现代性根源的不可取性来重新生产了既有取径的霸权。相反的,我主张,一旦全球连结被承认和理解之后,这样的看法应该被拒绝。

>本土社会科学

最近的全球多元文化社会学的论述主要来自于早期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要求自主性的发展和另外社会科学的传统。这种论述不怎么影响西方主流的社会学,但是野鸡挤了全球对话中许多的讨论。一个辩论的重点是地方知识和实践对于学科自主和发展的影响。像是多重现代性,对于什么事自主的传统可以提供给全球社会的讨论其实很少。若是现有取径的限制被看成是从缺乏和非西方学者的互动,那么主要的问题就是边缘化和排除。虽然这是很重要的议题,可是这也对于处理过于大有问题的社会学学科建构没什么贡献,也让各种建构版本一直继续衍生下去而已。

>世界主义社会学

现在我希望可以谈谈第三种取径,也就是一种以全球社会学为核心的普世主义。世界主义在这个脉络之下是一种规范性的想法,在这之中,世界主义的未来可以形塑当今政治的地景。这个必须被透过世界主义典范所重新建构的社会学所支持,也以全球包容性为基础。这个议题仍然只是可能,因为许多世界主义的理论家还需要「他们」被「我们」所包含。普世主义被认为是避免知识相对主义(包括西方社会学)的方式,但是对于世界主义如何被用来考虑以往被历史忽略的世界的连结这

点,还没有太多的讨论。承认这样的历史将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学的概念和分类,并从思考他者开始,而不是把他者看成问题。

所有上述讨论的这些取径都是透过加法来概念化全球,重视当代的多元文化与声音,但没有处理历史根源与轨迹。三个都考虑全球作为当代连结的社会,介于现在和过去的文明化里史之间,而不是认为殖民主义和奴隶是全球发展的核心。把全球当作唯一的当代现象,社会学的知识重建是希望可以应用到未来,有更好的对过去的诠释和概念理解。为此,我建议保留现在学科的阶层化。只是单纯的把边缘声音纳入,或许可以让我们认为社会学在未来可以变得不一样,但是却不能让我们承认到为了让社会学不一样,社会学必须要把自身连结到自身的历史(以及过去理解自己的方式)。

>连结社会学

连结社会学的观点是从承认组成事件的社会过程总是有更广大的脉落。这承认了多元诠释和选择的可能性。这不是作为事件和过程的描述,而是一个重新考虑我们已知的知识的机会。不同的社会学所需要的连结座落在时间和空间的轴在线,包括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时空交错。这些新的社会学将会时常出现龃龉,并且挑战现状,甚至对于基础有所抗拒(这样的抗拒也因为学院的地理阶层化而变得更容易)。而不同观点激荡的后果则必须开放检视,看看事件和过程在被不同观点理解之后有何不同。换句话说,和不同的声音对话必须超越简单的多元主义,必须产生影响,不是大家都来想同样的问题,而是我们都可以超越之前的观点来从不同的角度思考。

把政治社群当作国家政治秩序这样的观点已经是欧洲自我理解和历史社会学的核心了。然而许多欧洲国家既是帝国又是民族国家,而且更加阶层化。例如,虽然大英帝国是历史上多文化的政治社群,可是这个理解很少出现在当代政治论述之中,因为现在的政治社群被理解成等同于国家边界。若不处理殖民的过去,后殖民

的欧洲(和西方)是不完全的。这种自我选择的理解所产生的政治震荡可以在许多国家中的选举时的移民议题辩论中可以看出。

向，也就是去实践重新点燃社会想象，连结全球社会的社会正义。■

來信寄給Gurminder K. Bhambra <G.K.Bhambra@warwick.ac.uk>

选举代表了一个世代中了政治契约是可以协商的。然而这些契约包括了现在处境的协商，这发生在认同叙事的历史脉落之中，照定义而言，移民是被排除在国家历史之外的。除了政治社群的排除，移民也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被要求不要进入这个政体之中。然而，若我们了解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更广泛的一种活动，不只是原本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而已，也不只是把历史化约成当代国家疆界的历史，那么移民是欧洲、也是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一部分。了解移民作为中心的国家历史组成，并将其视为历史公民，而不只是即将成为公民的人。

一个「连结社会学」的取径需要从定位开始。这个定位是在世界中找到促成这个世界浮现的过程为何。从这里开始，我们必须从历史出法，把这个位置和世界链接起来，并且指认出和解释这样的连结如何比认同和事件更回广泛。常见的全球社会学取径其实并不重视历史，因为只关心欧洲的现代性怎么被带到其他社会。相反地，连结社会学家的方需要我们把欧洲放到更大的脉落之中，处理欧洲创造并且得利于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度的方始，并且检视欧洲可以从中学到什么，然后面对我们当今面临的问题。

这个结社会学的取径指出了一个方

> 我们想要的未来

by Markus S. Schulz,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美国, ISA研究副会长, 2014-18



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游客、登山客、朝圣者等，观赏富士山的日出。Markus Schulz 在 2014 年横滨大会之后所拍摄的照片。该次大会的主题是「面对不平等的世界」。ISA 会持续关注这个议题，并着重在不平等的世界如何被超越，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在不同的环境下奋斗，以其全球社会学如何贡献于这个议题。

Markus Schulz 是 ISA 的研究副会长。他介绍了 2016 年 7 月 10-14 日在 Vienna 举办的 ISA Forum 的主题：我们想要的未来—全球社会学与迈向更好的未来。更多的讯息请见 <http://www.isa-sociology.org/forum-2016/>

世界充满了不正义、冲突、环境污染。可是，人们还是渴望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样的梦想透过勇敢的奋斗，从 Chiapas 的丛林到 Johannesburg 的小镇，从阿拉伯的都市街道上到 Chicago，从移民的路径到新媒体的虚空间，我们都看到梦想在茁壮。乌托邦的能量没有被耗尽，并且依然启发着各种创意。未见的风险和机会需要新的思考方式。

全球化已经释放出了巨大的产能和财

>>

富。可是，它也创造了不平等、边缘化、贫穷。市场、国家、社会，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透过不同的方式结构化的全球变迁。没有任何的国家、城市、小区等可以免于全球化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和经验却是高度不平等和矛盾的。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那么多的移民，环境变迁也会加速这样的趋势。新的跨国空间已经增加了文化的多元性，可是社会流动性却没有提高。新的沟通科技加速的全球化，可是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产生新的控制、监控、和战争形式。

决定论的模型和军事响应的逻辑已经被证明是短视的了，而且代价高昂，牺牲了和平和安全。永续的解决方案需要更深的方法与分析问题。新的全球动态结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力量的结果，而是社会与制度的建构与形塑，也是能动的反身性。结果来自于选择与决策，不论是有意或无意的。

许多国家的社会学中，未来是被忽略的。为什么呢？许多因素之中，我想有一个观点特别普遍，那就是人们不处理未来是因为我们对于未来一无所知。因为我们不能讨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只好闭上嘴巴。

这样的观点其实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实做矛盾，因为我们的生活都是奠基在我们对未来的预设上面，不论短程或是长程，大或小。无论我们认为一见事情可能或不可能，可欲或不可欲，我们都会有期待、期望、希望、想象、计划、投射，这是人类的本能。

一旦我们接受的社会学是向前看的这样的观点之后，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概念化未来？什么是最有效的方式，以及怎么评价不同的思考实做模式呢？要知道答案，就要问什么样的理论取径我们应该采取。

过去，未来总是被预设是被决定好的，或至少朝着某个方向前进，所以可以多少预测得到结果。社会学刚刚成立的时候，宗教信念让位给了实证主义的社会法则，这也是Comte或Durkheim的视野。Marx则分享了类似的预设，说明历史的法则是通过无产阶级与布尔乔亚的斗争，虽然他也指出没有机械性的公式，有许多的空间给认知行动的自由介入。从全球南方来的学者，包括Amin, Cardoso, Dussel, Guha, Quijano, Nederveen Pieterse, Saïd, Santos, Spivak等人，都挑战了现代化的理论，因为现代化理论认为第三世界是发展落后的，而且唯有模仿北方才有可能赶上。

将社会经验和期望脱钩导致了理论的创新和高度不确定性。世界是有可能不一样的。

现实则不可改变，除非人类行动持续反思，冲突，合作。这样非决定性的思考模式越来越在当代社会理论种可以看到，并透过社会能动的引入和多重历史轨迹的交错，开启新的可能性、创意、想象、视野。

社会学的重新导向未来可以让不论经验、分析、规范性的取径可以受惠，也可以让宏观与微观的研究可以发挥影响力到整个世界。例如，行动理论最近的进展克服了实证主义的限制和狭隘的制度论。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理论可以帮助辨识和理解政治的动态。时间向度的分析可以帮助找到历时的脉动。批判理论可以帮助找出决策的价值、揭开利益的运作、并且确认不同场域的社会后果。

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包括人权侵害、气候变迁、环境污染、以及各种分配、认同、治理的危机，这都需要我们的努力，超越狭隘的学科边界限制与视野，找寻新的机会与可能。现在的经济危机让我们重新思考80年代提出的心自由主义模式，新的概念和方法也都必须被提出来面对我们的未来。若社会学要变得更切身相关，那么就要向前看，要和不同行动者所提出的观点相互激荡，想象未来。■

來信寄給Markus S. Schulz <markus.s.schulz@gmail.com>

> 法国社会学家辩论 查理周刊

by Stéphane Beaud,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Paris, 法国



Paris Metro. · Fabien Truong摄影, 一月12日, 2015.

社会科学有办法对于发生于2015年1月7-9日的事件提出一个「精确」的评论吗？（事件指的是查理周刊的攻击事件和犹太超级市场的反犹太杀人事件）。或是说，我们最好保持距离，让那些对社会学家怀有敌意的法国媒体知识分子评论就好？保持沉默似乎很难，特别是在我们看到了这起事件对于法国社会的影响力、以及于1月11日的大游行之后，我们似乎很难继续保持沉默。

在法国2005年暴动之后，Gérard Mauger建议应该要有社会学家对该暴动事件提出看法与研究。而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大众媒体也刊登了社会学家的不同观点，让大家有机会看到不同的公共社会学立场，因为这不可避免是理论又是政治的。然而这些评论又点燃了一个长久以来的争议：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是社会学家必须优先用来解释一个事件的呢？个人行为和社会背景应该被强调到什么程度？而奠基基于社会结构因素的解释是足够的吗？这些社会分析可以免除个人的道德责任吗？相反的，个体主义的逻辑会

>>

不会主导了社会学呢？

这些争议开启了一场很棒的辩论。而第一个加入战局的社会学家是 Hugues Lagrange，他是在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 at Science Po 的研究员，主要研究 Paris 郊区的青少年犯罪。他拒绝「政治正确」的犯罪解释，而将族群文化的根源视为独立的因素，而非社会经济歧视的结果。而 Kouachi 和 Amedy Coulibaly 的社会背景（移民第二代，在都市边缘的不稳定家庭长大，学业表现不佳，有前科，等等）和其之前的报导人一致，这也是其发表在 *Le Monde* (January 14, 2015) 的主要论点。他的文章：「有勇气看到去社会化弱势族群的道德错误」的论点主要有两的面向。第一，他承认那些在边缘社会长大的青年是「去社会化」的，被困在冥顽不灵和充满敌意的次文化之中。这些年轻人试着要透过新的宗教实践，包括 Salafism 和其他的激进伊斯兰教派，去重建他们「受损的自尊」。可是 Lagrange 说道，法国知识分子不去探究有问题的倾向（男性沙文主义、性别歧视、恐同、暴力、反犹太主义等等）以其如何导致了法国青年的迷失，因为他们不敢把这些连结到殖民主义，因为他们会感到罪恶，不赶面对那些从殖民地来的弱势族群所带来的道德错误。

接着，EHESS 和 Princeton 的人类学家 Didier Fassin 加入了辩论，重申社会学家的任务是客观地解释「社会原因」。年轻人在边缘的都市历尽了社会和空间的隔离，高失业率，污名、

歧视（工作、家庭、警察）等等，他说社会科学家应该避免历史学家 Marc Bloch 所说的「评价的习惯」。Fassin 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产生出了其所反对的巨大丑陋」。

Laurent Mucchielli 是 CNRS 的研究者，也是青少年犯罪专家，提出了长期的观点 (Mediapart, January 2015)。他说，法国还没有接受自己是一个有着为数众多北非移民的国家，特别是 1960 和 1980 年之间。这有两个后果，首先，移民被政策所排斥；第二，法国社会不承认自己是个多元族群但是不怎么多元文化的社会。所谓的承认，就是要去承认伊斯兰是这个社会基本组成的一部分，而且同时这个社会也在质疑、害怕、立法防堵这个部份（像是 2004 年的立法禁止头纱）。Mucchielli 呼吁要建立普遍公民身份，社会连带，以及集体认同。我们研究和这个立场一致，从经济边缘化、宗教污名化、以其种族主义等观点来解释。这是有力的观点，但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多。

我想有两条路可以让我们前进。第一，Cyril Lemieux (EHESS 研究者) 在其文章 *Unease in sociology* (*Libération*, January 30, 2015) 阐明了一种「理论」立场。Lemieux 是「实用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强调了「某些」社会学解释框架的限制。这可能特别针对被 Bourdieu 所启发的批判社会学而来。他说，这些社会学家忘记了除了结构性解释之外，还要认真看待穆斯林青年圣战士对宗教的渴求和期待。此外，Lemieux 认为那些社会学家忽略了那

三百五十万的「我是查理」大游行的政治和象征的操作面向。市民上街，是因为这么做对于道德和政治教育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最后他重新肯任了市民的自我反身能力，而这个能力，他认为，是批判社会学家所拒绝的。

第二个方法是经验取径，就是考虑那些不适用于宏观社会学和结构性解释的因素。三个事件中的凶手都被归类成贫穷和有困难的人。而 Kouachi 兄弟在青少年早期是孤儿，并在 Corrèze 的儿童支持制度环境中成长。他们并没有完全被剥夺掉制度支持，也不是种族歧视的牺牲者。例如 Amedy Coulibaly 就受益于百事可乐的技职训练，而且还在 Elysée Palace 里见过总统 Nicolas Sarkozy。类似地，Saïd Kouachi 是 Paris 市政府的「环保回收大使」，虽然 2009 年被解雇，因为其宗教的信念（拒绝和女性握手、一天祈祷 5 次），使得他和其他的同事产生距离。

这个观点提醒了我们一点，就是并非所有的法国圣战士都是从贫穷地区被征召来的第二代移民。有些青少年是在 pavilion 长大的，而非 cités。像是丹麦等国家，没有殖民地的历史，也善待移民，但是也受到同等的威胁，那又怎么解释呢？所以在我们把解释和问题化约到宏观社会学的因素时（贫穷、无技术移民后代青年、歧视、制度化种族主义），我们是不是也正在强化了把这些青少年归类成「危险」族群这样的刻板印象呢？

宗教社会学或许可以帮助理解这些年轻人的宗教情

感，以及他们献身于教派运动的动机和特征。这样的解释也需连结到我们怎么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极端主义运动背后的教条和逻辑，以及他们从伊斯兰实践所得到支持为何。我们必须考虑查理周刊事件发生的脉络，以及这些青年如何对于查理周刊嘲讽宗教的幽默产生反感，因为这种反感与敌意，对于由周刊所体现的 1968 文化下所成长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特别还是周刊称此自己是「愚笨且有害的」。所以，Julie Pagis 无法理解查理周刊对于伊斯兰教嘲讽的特别重要性为何（相较于其他宗教）。其重要性在于，周刊攻击了这些青少年唯一的正面依附和连结，同时也攻击了他们父母亲的殖民与劳工阶级的过去。

因此，我们可以问社会

学的不同预设为何，也可以问媒体如何建构了社会学的权威性。一个基本的问题当然是谁有权说话，而谁没有？事件之后，北非移民的后代之中成功的创业家和艺术家（演员、音乐家、喜剧、作家）和运动员开始发声。而学术人员也是，他们问了 W.E.B. Du Bois 的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感觉是怎样？」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可以提出在那些都市边缘做研究遇到的困难，像是 Kouachi 和 A. Coulibaly 所居住的地方。我们没有丰富的 cités 民族志，但是这很重要，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转变很大。我们需要经费去研究这些问题，并且资助那些具有这些背景的社会学家。■

來信寄給 Stéphane Beaud <stephane.beaud@ens.fr>

> 极端主义政治

查理周刊事件的前后

by Mabel Berezin,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美国,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ological Theory (RC16) 成员



Marine Le Pen是未來的總統候選人。

16

全世界的政治领袖和公众把查理周刊事件看成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也是对核心民主价值的攻击。可是，整起事件的演变让人们了解到凶手的背景其实有着更多的政治与社会重要性。例如，隔一天，在犹太超市犯下杀死四人的凶手让记者写道这就是 1930 年代政治幽灵的回魂。

查理周刊是法国和欧洲的 Sarajevo 时刻，这意味着这起攻击事件可能会为法国、甚至法国之外的国家带来政治危机。此外，债务危机、撙节政策、难民、青年高失业率、反犹主义对犹太教堂的攻击等等，这些现象都滋养着欧洲右翼民族主义的兴起。

法国的 National Front 和领导者 Marine Le Pen 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她继承了父亲的政治领导，反对移民的立场，是该政党的正字标记。而 Marine Le Pen 的目的是让 National

Front 成为执政党，而不是只是争议性议题制造者。并且着重在撙节、欧元危机、失业率。读者若是不熟悉 National Front 的历史，就会不了解为什么她的立场造成了那么多人的恐慌。Marine Le Pen 最近在《New York Times》投稿一篇文章名为「伊斯兰基本教义派」，认为这是伊斯兰的癌细胞，伤害了「我们穆斯林的国民」。这篇文章让欧洲的公众认为这个小党其实还算正常。

> 速度和政治挥发性

但是对于欧洲民主的威胁还是存在着。第一是欧洲政治地景的板块挪移的速度，选民偏好，和情感的挥发性。第二是政治和经济危机之间负面的结合，特别是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

>>



希臘的Neo-Nazi Golden Dawn運動。

2012 的春天是一个转折点。借用 Eric Hobsbawm 的话来说，是「充满能量的民族的春天」。欧洲的政治变动似乎加快了脚步，一个接一个的选举意外结果。左与右的政治极端主义开始在政治选票上有所收获，虽然 François Hollande 赢得了大选，Marine Le Pen 却也是第三名，结合在一起，极左派和极右派吸引到了更多的选票，甚至比原来的总统 Sarkozy 还多，也比社会主义的挑战者多。

在大选之后没多久，希腊的新纳粹政党，也就是暴力的反移民 Golden Dawn，取代了原本的右派政党，而原本默默无闻的 Socialist coalition 也取代了 Socialist 党。2014 年末，只在查理周刊事件的之后不久，希腊又再次大选，Syriza 执政，而 Golden Dawn 成为第三大党。瑞典的选举动荡也出现了。其不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一员，也不受欧盟的撙节政策影响，但是瑞典的国会大选中，右翼的 Sweden Democrats 也从 2010 年的 6% 选票上升到 2014 年的 13%。

在同一个时期，意大利的 Five Star Movement 也出现在 2013 年的选举之中。而西班牙

的左翼 Podemos 运动则崭露头角。虽然德国的右翼反移民运动 Pegida 是唯一少数老字号政党，但是也有可能发挥影响力，这情况特别是在 Thilo Sarrazin 的 2010 书《Germany Is Doing Away With Itself》成为了畅销书之后，更是如此。

> 负面协力和政治情绪

尽管这些政党有着很不同的特征，但是有着一个共通点：就是对于民族国家的信念相当坚定，不信任欧洲整合，也反对全球化。他们反对欧元，也反对撙节。

查理事件让移民和整合的议题成为了紧急重要的课题。若是欧盟的撙节政策严格的施行，让 Le Pen 等人可以把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描述成危险的事情，那么查理周刊的惨案让他们更有理由反对移民和宣称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存在。虽然这早就是欧洲右派的论述了，但是法国的总理在事件之后说道「族群和社会隔离」时，还是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右派论述。

1919 年，John Maynard Keynes 写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件将不会被政治人物的理性行动所形塑，但是会被隐藏的暗流，隐藏在政治历史表面下的暗流所影响，而没有人可以预知结果。」Keynes 对于一次战后欧洲的评论适用于现在的欧洲，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正在见证欧洲 1930 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回魂吗？虽然 Golden Dawn 摆明了支持法西斯主义，法国 National Front 和瑞典 Sweden Democrats 都是民族主义政党，不是威权主义。一些人物像是挪威的 Anders Breivik 不应该和现在的政治发展相提并论。若要说法西斯主义再次出现在欧洲，我想是太过简化了，就像人工打字机要再次成为主流，是不太可能的。欧洲的民族国家大体上都是程序民主国家，即使匈牙利的总统 Viktor Orban 支持「不自由的民主」，但始终还是有民主的元素在。

但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担心的理由。欧洲的隐藏潮流是相当黑暗的，而且集体的情绪召唤着历史。Sebastian Haffner 关于 1930 年代德国的自传里面，指出了希望、绝望、恐惧、误读的愤怒等，都是希特勒发迹的不可或缺因素。类似的集体情绪在今日的欧洲还是可以看见。在法国，在近日的民调里面，人民「失去信任」、「失望」、「丧志」等等都可见一斑。而「热情」则是最后一项，这也不意外，因为保守派记者 Éric Zemmour 的 French Suicide

[Le suicide français] 是法国今日的畅销书。

若没有经济危机和撙节政策，极左和极右的极端主义政治不可能具有吸引力。自从 70 年代以来，经济政策并没有运作得太好。相似地，移民和融合政策不论是以 19 世纪民族主义或是多元文化主义为基础，都必须再次考虑。要超越现在的困局，欧洲领导人必须要想象和实行新的社会团结政策，纳入所有的公民。领袖必须重新点燃人民集体的希望：一种可以想象未来的能力。经济政策重新校正是个出发点，但不是终点。欧洲领袖要务实的思考政治社群的意义，因为社群的边界还是民族国家的边界。政治人物也要对抗那些其实不是那么隐藏的暗流，或是对抗那被查理周刊事件所接收的政治风险。■

來信寄給 Mabel Berezin <mmb39@cornell.edu>

> 田野笔记

在欧洲体验恐惧

by Elisabeth Becker, Yale University, 美国



Elisabeth Becker在一座清真寺庆祝。

田野民族志可以让我们进入其他人的世界，观察和参与他人的日常生活。不像档案研究、访谈调查、或是实验方法，民族志其实会受到真实世界的打扰、中断、改变。这就发生在我于欧洲的三个国家的清真寺田野研究中，特别是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

我选择清真寺作为田野场域是因为我想要研究穆斯林在欧洲的文化与精

神生活，以及他们怎么面对污名。我也想要知道穆斯林的日常生活面貌，从细微的祷告等日常实做去切入他们的生活肌理，并参与其中，而非分析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进入田野——在 Berlin, London, Madrid 的清真寺——是需要个人层次的转变的。我同时是一个追求时尚的女性主义者，所以我对于怎么在维护自己的认同为前提之下呈现自我与田野场域

>>

中，是相当挣扎的。首先，我不知道怎么戴头巾，不是盖住脸就是掉到地上。后来我发现我戴上头巾或是Hijab之后，在Berlin搭公交车都会遭来异样眼光。在London的Algate East可以自在地点咖哩，而在Madrid的清真寺则也会遭到注目。当我以穆斯林的身份生活时，我是会感到恐惧的。

我不会害怕在德国有人从脚踏车摔下来时看到我的头巾因此生气，但是我会害怕右派的Pro-Köln运动，他们是一小群人，但是有很大的声音，要求在Köln这个天主教城市禁止清真寺的设立。我不会害怕清真寺，唯有一开始进入田野的时候年长的穆斯林女性会不了解我在那边干什么。我穿得很得体，但是还是和她们不一样。我嫁给了穆斯林。而穆斯林女性总是会调整我的头巾，加上另外一层，并且放下多额外的头巾到肩膀上面，并且把我的裤管拉低，然后把袜子拉高，「帮助」我属于这个空间，另外就更不用说教我阿拉伯字了。她们甚至要求叫我Fatmah，因为她们不确定拥有Elisabeth这个西方名字的人在这里是不是另有其他意图。她们想要把我改名，以保护她们的空间，并且确定我了解她们的规则。这些都是我在London做田野时的恐惧，不过算是小的，也是田野研究者普遍都会遇到状况。

而我在London的第二

个田野地点，我感觉到比较多的自主性。我和我的田野对象的区别在这里比较清楚，她们几乎整个人生都在这边了。而或许矛盾的是，这样的区别反而让界线有点模糊。我可以超越界线，和我所认识的女性朋友讨论小孩，或是食物好不好吃，即使我们有着很不同的审美观。这些女性也质疑我在这边的「真正」动机，而许多人也相信我的学业是比我肚子里的小孩还要次要的事情。

我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数周到达了Madrid。我喝着昂列咖啡，走过Retiro Park，而我的清真寺搜寻很慢才开始，当我问地点时，很多人疑惑地看着我。「妳确定Madrid有任何的清真寺吗？还是妳是说Cordoba？」他们总是这样回答我，彷彿什么都不知道。当我问穆斯林女性时，她们笑说，清真寺不会在城市里面，不会在首都。我可以感觉得到，穆斯林社群在西班牙有着长期以来的恐惧。这不是因为Paris的攻击事件而来的，但是这个事件恶化了远本的恐惧感。查理周刊事件之前，在我第一个拜访的Madrid北边的清真寺，女性都闪我远远的。我想要参加她们的活动，她们都说没有活动。第二个地点比较南边，守门的人问我是不是真的来到了对的地方。我说是，他就把我带到有小孩子和母亲的地方，小孩子吻我的小孩的脸颊，而

母亲们则疑惑地看着我。

然而，事件之后，疑惑的眼光不再，因为几乎人去楼空。我在一间小masjid祷告，可是从来没有人出现。即使是最大的清真寺里面，们都锁起来了。我带着我的小孩，只遇到几个女性，两个在聊天，两个在祷告，一个在睡觉，没有人理我。恐惧的感觉穿透我的皮肤到我的骨头里面，这是我做研究以来，第一次感到事情非常不对劲。

在Madrid我也感到恐惧，特别是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清真寺几乎都空了，取代的是警察的巡逻。警察带着枪，到达Puertadel Sol—阳光之门—也是城市的中心，警笛声大作。Pegida运动(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West)的抗议就在清真寺外面。这个运动在去年10月于Dresden成立，即使他们的抗议是非法的，但还是发生。查理事件之后，清真寺的墙上都被写上「滚回去你们的国家」或是「伊斯兰该死」的字眼。我也在人与人避免联系的社会过程中发现恐惧。人们质疑我在这里的目的，认为我不单纯，不能在这边做研究，也怀疑我和我的小孩。

我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认真考虑要中断我的研究，因为我似乎低估了这个研究的政治敏感度。我的想法是我想要把我研究

对象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放入括号，但是实际上政治却穿透了这个宗教的世界，也穿透了我的田野经验。不论背景为何，清真寺都受到了威胁。这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待在清真寺里面是危险不安全的。而事件之后，我甚至收到美国朋友的来信，问我 ISIS 在沙特阿拉伯犯下的案件，问我如何可以和穆斯林有来往，问我会不会感到羞耻？会不会害怕？我和西班牙的穆斯林年轻人的一次对话内容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他们说他们要不断地说明他们和 ISIS 的不同，证明自己是不同于他们的。

在 Madrid 的恐惧随着我回到了 Berlin。朋友说，她们总是待在家里面，也说地铁里面总是看到不确定的笑容，以及也考虑要搬离开欧洲。年长的土耳其男性也都说要回到土耳其，年轻的穆斯林男孩则说要他的姊姊在有一次帮助非穆斯林的人上巴士月台的时候所收到的威胁，路上的行人也不让路。「某人应该拿刀砍她」，说这话的人在巴士上，并不是小小声说而

已。而该男孩问起我在美国 North Carolina 被杀死了三个穆斯林年轻人，「无缘无故就被杀？」他眼中泛着泪。这是一个 11 岁的小孩，是玩魔术方块的专家，只喜欢 Ferrero Rocher 巧可力，但，连年纪轻轻的他，也感到巨大的恐惧。

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让我们都容易受伤，更容易感到害怕。民族主义右派运动想要利用这种恐惧，并拒绝承认我们其实某个意义上都是边缘人。在德国，右翼的 Pegida 运动已经在 Dresden 号召到了 18,000 人，想要「抵抗伊斯兰化」。或许 Angela Merkel 会说穆斯林属于德国，并且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可是恐惧和威胁还是蔓延着欧洲。并且社会真实的面貌也被查理周刊和 ISIS 等的攻击行动所模糊掉了。

不论是研究者或是公民，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恐惧，这种深入皮肤底层的恐惧。安全和怀疑只会模糊焦点。我必须要和我的邻居，不论种族和信仰，抵抗极端主

义，并透过我们想要维护的公民传统。我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是在两个世界游走的研究者，我的恐惧从日常生活变成存在意义上的。我在退缩，退缩的界线之内，而那些界线是我想要跨过的，也不相信的。但是现在，我没办法两边游走了。■

來信寄給 Elisabeth Becker
<becker.elisabeth@gmail.com>

> 搜寻巴基斯坦的社会学

by Laila Bushra,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以西方的标准来看，社会学在巴基斯坦很难称得上是一门学科。Hamza Alavi 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国际看到的社会学家，主要的作品发表在 60 和 70 年代。从 Alavi 之后，没有真正严肃的社会学作品出现过。而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到是有，已有最近出版的一些关于伊斯兰军事运动和巴基斯坦军队与地缘政治的作品。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或是自我标榜的社会学作品还是缺席的，也没有社会学的组织或是期刊。

巴基斯坦所谓「实存」的社会学包括了五位社会学家，三位在美国、两位在英国接受训练。他们在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LUMS) 教书，听起来有点讽刺。这五位之中，有两位的教学和研究重心转移到哲学和政治学了，其中一位休假中。在这个历史脉络下，可见的未来其实不用期待什么。

1990 年代，LUMS 是最有名的私立商业大学，设立了第一个四年制的学程，主要是由欧洲和北美训练出来的老师教学。因此，产生了种特别且昂贵的美式大学教育学程，脉络是巴基斯坦的公立大学成效不彰。虽然 LUMS 的学程只有提供经济和信息科学的学位，但是课程其实包括了一些社会科学的科目。不过这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科目主要是陪衬的，有老师授课才提供，并且是由兼任的教授所开设的，并且通常是在地的师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或是心理学家。

从一开始，学生即使是为了来 LUMS

学习那两们主要的领域，他们仍就相当正面的反应这是一个新鲜的设立（巴基斯坦的标准来说）。随着时间过去，社会科学逐渐成为了独立的主修科目，主要是为了因应越来越多的学生没有办法符合信息和经济学的严格标准，但是还是想要拿到学位。另外也是整体来说学生人数的增加导致。

LUMS 的大学学程已经有 20 年了，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系所也历经了一段历史。终身教授的其中一些人花了很大的功夫去重新制定课程规划，必且透过学科边界的巩固去定义其位置，而非只是不加区分地看是拿到什么学位而已。我是唯一的社会学家，而我当时是被人学家所聘用的。而系主任本身就是人类学家，最近将社会科学主修拆程许多社会科学的科目，像是政治和经济、政治学、社会人类学、历史、英文，还有副修像是心理学和哲学。我们每年至少举办一次跨学科的国际会议。必且和国际学者合作。但是我们还是面临了像是师资、学生要求等的老问题，以及管理阶层的敌意等的新问题。

除了少数几位老师为了个人或是研究的需要而打算扎根在巴基斯坦，其他的人还是希望有更好的机会到欧洲、北美，或是东亚或是中东等地方。许多人延长了休假，到国外去短期客座或教书，希望可以找到终身职的工作。

而管理阶层并不认为高教师流动率是个问题。他们偏好的是松散、比较不组织化的社会科学系所，或许连系所都可以不用设立，而老师就都用临时兼任的就好。的

「我们是没有社会学的国家，
不过我们很需要社会学的分
析！」

确，LUMS 的中央管理阶层并不喜欢超过两年的新的学位，并且不尊重社会科学。学生或许有兴趣，可是没有人会认真把这个当作主要的领域。每年管理阶层都会给我们一份调查关于学生想要的主修科目，社会科学常常垫底。比我们还要惨的是历史。学生会选修我们的课，可是不会当成主修。

还是有成功的地方。许多学生到了研究所的时候就会去申请社会科学，而且他们的被录取率很高。在这边也是如此，许多学生希望可以毕业之后到媒体界、智库、或是国内化的公司组织工作，领域包括了发展、媒体、公共政策、都市研究等。若是这些学生足够聪明、有动机、有野心，我相信他们持续会做这样的选择。至多一个或两个学生每年会立志朝学术迈进，不过不太可能是社会学。

若巴基斯坦没有社会学，那么或许社会学可以多些努力来到巴基斯坦。我不期待受过西方训练的社会学家会来到这里，甚至巴基斯坦公民都很少会留下。而且要社会学家和巴基斯坦学生互动也是很困难的事情。2008-2011 年我举办了一系列国际的演讲，希望国际的教授可以来和这里的学生互动，启发这里的学子。在政治学和历史学有成功的例子，但是没有社会学家愿

意来。或许可以期待未来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我们也要更积极地和 ISA 互动，有些计划像是全球教室就很适合我们。

不过，或许最重要的是期待世界各地的社会学研究生。我想说的是，巴基斯坦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但却是被误解得最多的国家。这个国家和社会并没有被系统性地分析，所以想要挑战困难问题的研究生或许可以考虑来巴基斯坦研究。博士生也可以考虑来到这里教书的优点：有动机的学生、教学自主性、合理的教学量、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交流。我们是没有社会学的国家，不过我们很需要社会学的分析！■

來信寄給 Laila Bushra <laila@lums.edu.pk>

> 巴基斯坦社会学的前景

by Hassan Javid,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当 我刚开始在找工作的时候，我知道社会学家可以找的工作可说少之又少。巴基斯坦就像世界其他类似的国家一样，科学和工程被国家所领导，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地位非常偏远。即使有社会学系所，制度的限制也让这个学科有跟没有一样。在公共部门中，政府总是介入课程规划和设计，并且总是对学术有敌意，所以环境不利于教学和研究。私人部门中，大学总是希望设立经济、商业、信息科技等等，因为这些最赚钱。

在这个脉络之下，我申请了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LUMS) 的工作，这是一个巴基斯坦顶尖的私立大学之一，而且是少数愿意支持社会科学的大学。当我申请工作的时候，LUMS 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院刚历经改组，之前的虽然授予社会科学学会，但是现在变得更加专门化。所以，虽然我申请的是社会学，可是我加入了政治系，

我的背景是政治和历史社会学，兴趣在国家、阶级、和南亚的民主化。所以在政治系工作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政治系有空间也需要额外的师资，而且政治学是仅次于经济和金融的最受欢迎的学科，每年有 150 名大学生主修，这和人类学和社会学系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这些学科只有 10-20 名新生。大家也

都相信政治学比较好找工作，而且也影响到师资的聘用。所以社会系在缺乏老师和学生的情况下，只会越来越边缘。

在巴基斯坦工作的限制也很多。即使在 LUMS 这个相当特别的大学里面，言论自由受到很大的保障，但是研究的资源却是很少，物质或制度的支持短缺，而且没有研究生。这些困难也因为缺乏更广大的学术社群而更加严重。

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族群、多宗教的国家，大约有 2 亿人口，殖民时期的影响很大，并且快速都市化、经济变迁、民主化等，也带来了文化、抗争、社会运动的兴起和改变。可是，在 911 事件之后，对于巴基斯坦的研究都放在伊斯兰和军事上面，越来越多的资源被投注在这里，特别是西方的资源，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致力于这些应用问题，所以一般的学术研究已经开始下降不少。政治学里面，这意谓着国际关系和安全的议题越来越受重视，同时，量化方法也受到国外赞助者、组织、政府的喜爱，许多研究都聚焦在很窄小的政策问题上，而且只能用经济学里面的计量模型所回答的问题。所以巴基斯坦被视为是暴力宗教极端主义的中心，而治理问题则可以被那些政策研究的模型解决。这样的偏见反应在最近关于巴基斯坦出版品之中，即使是研究左派政治或是农业经济的书都可以看见伊斯兰出现在标题

「无论在公部门或是私部门中，社会科学可以说是几乎不存在的。」

里面。

作为在政治系教书的社会学家，我逐渐发现唯一的研究、社会、理论等的对话都是在这些情况下发生。可是我的研究中，我已经研究了国家和南亚精英的关系，重点摆在殖民时期的制度和介入，特别是农业经济，有着对于资产阶级去追求他们自己利益有很大的影响。我也对于解释巴基斯坦当代民主政治很有兴趣，也希望可以研究精英权力怎么样在经济、政治、社会的变动情况下，被重构和再生产，。

在和伊斯兰与政策没有直接关系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其实没有太多人有兴趣。相同的还有族群、性别、都市化等议题。此外，社会学家也仍缺席。我大多数合作的都是经济学家或是政治学家，但我也发现他们的视野其实都是从他们的学科出发，并且都是他们赞助者青睐的。其他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也都遭遇类似的经验，学科之间的概念和方法差别大到让我有点沮丧。

巴基斯坦的社会学虽然让位了给经

济学和政治学，因为这些学科都有企业和政府的赞助。所以未来其实也不会有太大个改变，市场和政治让巴基斯坦的社会学没有办法建立，也让许多学生只好选择其他的科目。不过，即使如此，巴基斯坦还是欢迎那些要追求有趣且有挑战问题的学生！■

來信寄給 Hassan Javid <hassan.javid@lums.edu.pk>

> Ulrich Beck,

来自欧洲的世界主义社会学家₁

by Klaus Dörre,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y, Jena, 德国, ISA Research Committees on Sociological Theory (RC16), Sociology of Work (RC30), Labor Movements (RC44), 和 Social Cla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RC47) 委员



2014 年 Beck 接受了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是由 ISA 的未来研究委员会 (RC07) 所颁布，表彰对此领域的贡献。

Ulrich Beck 的风险社会概念刚提出了的时候在德国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他的论点相当有争议性，那就是社会实在已经不再被社会学的概念所掌握和描述了，而且一种近乎革命性的转变就是多重现代性的诞生，而且就在似乎无懈可击的工业现代性里头诞生的。若想要了解这个转变，那么就必须打破「马克思-韦伯现代性共识」和其线性的默认。Beck 认为现代性的主流社会学理论，特别是资本积累(马克思)或是理性化和官僚化的线性成长(韦伯)，是一种「超主体限制」(supra-subjective constraints)，描述社会行动者的法则，以其所有的社会行动都要服从这些法则。Beck 则提出 self-endangerment 的概念：「更进

一步的现代性正在消解工业社会的轮廓」。在过去的自动化进程之中，工业社会已经「太过头了，甚至被『废止』了，就像工业社会现代性去镶嵌化了地位和封建社会一样，然后再镶嵌了自己。」

Beck 视三种发展为转变到不同现代性的三种指标。第一是不可预期的工业生产副作用，也是 Beck 认为的历史推动力。生态风险和不可逆的影响已经成为全球威胁，一种民主 Allbetroffenheit，也是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关系的威胁，最终不会区分谁是工人谁是资本家。「风险分配的民主逻辑」已经逐渐取代「财富分配逻辑」，所以不能再用阶级斗争、理性化、功能差异等等来理解。Beck 说：贫穷是阶级

的，但是灾害是民主的。

第二，这个生态社会的冲突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当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无法减小，特别在战后，社会就会形成许多层级，就像是「电梯效应」(Fahrstuhleffekt)。即使最少的财富平均来说也远远多过于之前的世代，而且也有更多的个人选择。

传统社会环境已经大大削减了，阶级也不再是一个人的经验世界，仅仅成为统计的数据而已。个体仍然是最后的生产单位，被迫成为计划的中心，规划自己的人生，并且接受可能永远无法翻身的缺点。主体被「设定成自由的」，阶级、层级、性别角色的社会形式无法限制个体，个体不会被「释放」到社会组织的实际限

>>

制之下。

第三，这是Beck的公民社会次政治的浮现。这也是工业社会政治和非政治边界之消解的起点。科技的进步变成社会分类的合理化的依靠。不论是否主题是核能或是基因工程，专家都总是要准备好在辩论中可以和一般民众沟通。左和右的传统区别没那么有用了，因为新右派支持释放市场力量，去管制化，加速科技发展，而生态的左派则用了比较保守的保存观点，应用到自然环境上，因为这总是被拥有和社会化的。生态运动和绿党的出现，以及其他的结构政治变迁，都代表了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政治和非政治之间变动的边界所解释。

Beck的整个学术生涯有时后会修改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论点，但是都是改进。虽然风险社会是非常德国的作品，特别是社会风险的个体化那一章，但是Beck马上处理的世界风险的议题，这是生态危机全球化的结果。在这个地方，他倡议了世界主义的观点，把跨国空间和政治考虑进去，甚至讨论复杂的世界风险社会错置。其对于发展反身现代性理论的努力也让其有了其他作者的回响：Anthony Giddens, Scott Lash, Bruno Latour

如果我们仔细想想Beck的贡献，他对于生态社会冲突的社会学理解可能是最好的观点。他对与生态风险的知识 and 定义的严谨思考就像他讨论「危险的权力」一样，仍然很重要。的确，气候变迁的风险是今日政治斗争的中心，却许会暂时被摆到一边（就像现在大家在忙着讨论欧元危机），但是终究会回到中心，以社会动荡的形式出现。

Beck的最后的成就是指出了这样的现实并且转译成社会学概念。是的，他对于「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诊断后，认为要「回到阶级」，因为阶级差异现在越来越明显，甚至国家之间的阶级差异更大。社会错置、发展停滞、生态浩劫等等把「财富分配的逻辑」和「危机分配的逻辑」转变成相互增强的两者，增强了经济—生态的危机。向上社会流动的方式变成了非得要把人退下去才得以可能。

Ulrich Beck清楚地看见了发展（也恰好了呼应了古典的资本主义理论），但是他并没有或是没意愿去分析非传统阶级的形成。可是Beck对于时代精神有很棒的理解，也对新的和非预期的发展有很好的观察。最近的Beck作为一位世界主义者和民主欧洲人，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反对「Merkiavellism」。他认为这会让南欧成为永久的次等地位，因此会威胁欧洲的整合。

Ulrich Beck留下了深刻的知识足迹，若没有他，我想我不会成为一位社会学家。他走得太快，并且留下了许多无法马上填补的空隙。我想德国和整个欧洲社会学要过了一段时间才会知道到底失去了多少。反生现代性的理论仍然有待持续建构。重新评价这个原创性的思考或许是一个可以继续发展Beck知识遗产的一步。■

來信寄給Klaus Dörre Klaus.Dorre@uni-jena.de

注1：原文为德文，由Jan-Peter Hermann和Loren Balhorn翻译。

> Ulrich Beck 在拉丁美洲

by Ana María Var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tín, 阿根廷,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RC24) 内部委员



圖：Ulrich Beck和Ana Vara 與Sang-Jin Han

怎样衡量Ulrich Beck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呢？他的作品巧妙地链接了人类、环境、和科学技术知识，对于那些被自然所定义或是工业做所追求的不论是一般人或是社会科学家，都有着很大启示。

在Beck的风险社会概念和其他拉丁美洲的依赖发展主义理论之间，其实有着很深的连结。后者为了解释拉丁美洲的后殖民处境，忽略了历史过程之中不论是外国或是国内精英对于自然资源的无尽剥削的这社事实。这已经变成常识，而且是1970年代依赖理论背后的预设，也是现在关于extractivism或是neoextractivism的背后基础。我没有办法去直接理论化Beck风险社会与这个论述之间的关系，不过我会做个两者之间的对话，希望有对两者的厘清有所帮助。

Beck对于风险的基本定义是「技术经济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副产品」(1992: 20)。这把焦点放到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暧昧性质，或是两面性。以Beck的话来说，好的工业化过程所带来的坏的结果，在拉丁美洲是更显而易见的，因为拉丁美洲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加速了这个过程，并且带来了对社会和环境很大的影响。而风险分配的问题也在不平等的结构下变

得更加显著。这个意义来说，Beck的理论建构了对这个区域的发展的长期视野，贡献良多。

此外，在欧洲和美国，风险社会总是被解读成风险是「民主」的，强调酸雨或是车诺堡辐射的危害是不会认人的。可是，其实Beck一开始的关怀是在于风险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其国家内或是国家之间风险的不平等分布。他讨论印度的Bophal灾害和巴西的Villa Parisi的严重污染时，他写道：

即使风险正在进行全世界的平均化，但是我们不能误以为风险分配就没有社会不平等的面向。风险位置和阶级位置是重迭的，而且是在全球的层次上进行重迭。全球风险社会的无产阶级

早在1930年，后来成为古巴革命的官方诗人Nicolás Guillén写了一首诗，Sugar Cane：

The black man
beside the cane field.

The yankee
above the cane field.

The land beneath
the cane field.

Blood that is draining away from us!

他是在谴责美国公司在古巴制造糖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破坏。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风险的生产和分配。可是风险的定义也是Beck对于拉丁美洲发展过程的认识的另一大贡献。谁有权力定义风险呢？就是那些控制了「定义的关系」的人，并且掌握权力。在讨论「全球风险的不平等」时，Beck说道：

一个若是想要揭开世界风险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那就必须揭露风险这个概念的法则。风险和社会不平等，风险和权力，这都是一体两面的。风险预设了决策和决策者，而且生产出了激进的不对称。这不对称是介于决策者和受影响者之间的不对称。决策者做决定，受影响者承担决定，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2014：115，强调为原文所有）。

这个情况也可能改变吗？弱势有可能被听见，然后拉丁美洲会克服这个正在进行的新殖民主义吗？在最后发表的文章中，Beck宣称了「世界的后变形构」是正在进行中的，也是「坏影响的好的一面」，这隐含着「在我们想象力外的变化」，而且多数是气候变迁的结果，以及如改变了我们：「我们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以其我们想象政治的方式」（2015a：75-76）。

虽然他强调「依赖理论」和「世界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异，但也警告说：

后变形构在理论上来说是还没完成的概

念，但也不可能被完成，因为它是开放的，也有可能翻转。即使权力关系已经被打开，即使有更多的依赖的对称分配与平等（的期待），这意味着世界主义不可以被新帝国主义所工具化吗？不，不是的。世界主义化不是单向的，所以也有可能强化了既有帝国主义的权力结构。（2015b：122，强调为原文所有）

他承认他的「后殖民主义的后变形构」（metamorphosis of postcolonialism）的概念还没有完全发展好（Ibid.：121）。而他的过世也中断了这个理论建构计划。不论如何，在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家和一般民众将会继续从Beck身上学到东西。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很多书（像是《Weltrisikogesellschaft》，《Fernliebe》，《with Elisabeth Beck-Gernsheim》，《Das deutsche Europa》）等都被早于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他是学者也是知识分子，也在公共领域相当活跃，这在拉丁美洲来说特别令人受到尊敬。■

來信寄給 Ana María Vara <amvara@yahoo.com.ar>

References

- Beck, U. (1992) [1986]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eck, U. (2014) Ulrich Beck. Pioneer in Cosmopolitan Sociology and Risk Society. London: Springer.
- Beck, U. (2015a) "Emancipatory catastrophism: What does it mean to climate change and risk society?" *Current Sociology* 63(1): 75-88.
- Beck, U. (2015b) "Author's reply." *Current Sociology* 63(1): 121-125.

> Ulrich Beck

在东亚的影响₁

by Sang-Jin Ha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南韩, ISA
Research Committee for Social Cla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RC47) 内部委员



Beck 对于南韩 Sewol 沈船事件有些鼓励的话。有时候「坏」的事情会有一些「好」的非预期后果，也就是船难的发生让大家更重视了政府的不负责任这个议题。

公共的注意是由论述地景和历史社会过程所形塑的。Ulrich Beck 在东亚——特别是南韩、日本、中国——的影响可以透过讨论这个地区的问题、可能来被阐述。而讨论也不只限于风险的认知，还包括了对于未来的敏感度。

东亚代表了世界上在战后最成功的现代化典范，这是一个被压缩的现代化，让人民有了骄傲和自信。可是非预期的结果来自于快速的现代化、官僚化、威权发展国家，深深影响人民生活。结果就是伴随而来的致命风险，把光明的现代化带到了黑暗的一面。

东亚的规范性传统，像是儒家文化、道教、佛教等，在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下还

是屹立不摇。这些传统藉由关注资本主义全球话带来的风险议题，使得原本保守的它们成为了批判风险社会的论述来源，因为风险社会危害了人类尊严、共生、人本的精神。

Beck 在这的地区受欢迎程度有三个明显的原因。首先，Beck 的风险社会概念非常真实，特别是日本的福岛核灾 (2011)，韩国的世越号沈船事件 (2014)，或是北京的沙尘暴。第二，除了风险，Beck 也提供了新的未来愿景：反身现代性或是第二现代性。这个视野对于东亚追寻自我认同和未来有很大的启发，因为这不只是复制西方现代行而已。第三，Beck 对于参与风险治理的倡议也很重要，这和以往的传统国家治理和科学官僚模式大大不同。

Beck 在 2014 年的 7 月访问 Seoul 显示了他的公众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个国家仍然还在世越号的四月事件的阴影之中。政府对于罹难者（包括上百人，还有年轻的学生）救助的无能让公共的愤怒被点燃了。Beck 在韩国媒体中心的国际会议厅有一场演讲，座无虚席，虽然主题是环境变迁，但是 Beck 也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认为民众的愤怒可以转化为改变的动能。因为「坏」的事情可能会有非预期的「好」的影响。他并说，这个事件可以让大家更注意政府的不负责任。

后来 Beck 加入了 Seoul 的 Megacity Think Tank Alliance (MeTTA) 的论坛，主题是「超越风险、迈向安全」。在于 Seoul 市政府直播的电视上，Beck 强调了新政治的重要：

>>

东亚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国家彼此连结，但是有着历史的纠结。若他们没有办法成立一个亚洲联盟，那其实没有理由为什么这件事情不能由城市来做。像 Seoul 这样的城市可以一起成为「城市联邦」，而非国家联盟。城市可以成为世界主义的，并且全球的，这就是城市合作的第一步。

Beck 突然的过世震惊的整个南韩社会。保守和自由派的媒体都哀悼他。Seoul 的市长 Park

Won-Soon 延长了追思会，说：「我会努力让 Seoul 成为一个模范城市，可以克服 Beck 教授所警告的各种风险，并且透过市民参与和都市合作的方式来达成这个目标。」韩国大学 Kim Mun-Jo 教授写了一篇讣闻给 The JoongAng Ilbo。而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的 Hong Chan Sook 教授也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给 The

Kyunghang Shinmun 纪念 Beck。她说道在 Munich 的经验：「他总是提供帮忙和温暖给他的学生，特别是那些远从东方而来的学生。」

在 The Hankyoreh 中，我描述 Beck 是一位我遇过的西方学者中最温暖且热情的一位。在 Park 市长的要求之下，Beck 同意执行一个「Seoul 计划」，是一个参与式风险治理计划，预定在 2015 年 1 月开始。而 12 月 22 日他还在 Skype 中表达了对这个计划的热情期待。他甚至提出了「东亚风险行动者议会」的概念，这是从 Bruno Latour 借来的点子，在

Paris 的一场会议之后被提出。今年 3 月，当 Seoul 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知名的僧侣 Ven. Myoung Jin 主持了追思 Beck 的仪式。Beck 夫妇和他在 2008 年访问 Seoul 时见过面。

在日本，Beck 首先在环境社会学被重视。然后在 2000 年代早期，他的个体化概念越来越受欢迎。但是 Beck 在福岛核电厂事故之后特别重要。在 2011 年的一个访谈中，他解释了风险的本质，但是也鼓励日本民众要参与去防止工业和专业对于技术决定的垄断。

Beck 风险社会理论在日本的影响类似于车诺比核电厂爆炸案之后对于世界的影响。日本在事件之后的主要报纸：

《Asahi Shimbun》，《Nihon Keizai Shimbun》，《Mainichi Shimbun》，《Yomiuri Shimbun》，《Sankei Shimbun》等都有报导他的贡献。Beck 的好友 Munenori Suzuki (于 Hosei University) 描述 Beck 市一个心胸宽大的知识分子。」

Beck 或许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陌生了一点，但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却是很熟悉的。至少有 8000 篇中国的期刊文章提到了 Beck 和风险社会。尽管对于一般中国大众来说 Beck 不是太熟悉，可是主要的报纸和媒体也都报导了 Beck 的过世消息。文汇报用了一整个篇幅的报导：

「Beck 的风险社会理论 4 个关键词」之中，复旦大学的孙国东教授摘要了 Beck 的理论；

「第二现代性、反身行、次政治、世界主义」。而清华大学的吴强教授也写了一篇文章到新世纪杂志。许多学术界人士

也到微博上面发文纪念 Beck，就像在日本和南韩一样，Ulrich Beck 的过世消息在中国也有许多人哀悼。■

來信寄給 Sang-Jin Han <hansjin@snu.ac.kr>

注 1：作者想要感谢 Sae-Seul Park, Midori Ito, Mikako Suzuki, Yulin Chen, Zhifei Mao 等人对于南韩、日本、中国信息的收集帮忙。

> Ulrich Beck

在北美的多重影响

by Fuyuki Kurasaw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加拿大,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ological Theory (RC16) 内部委员



Beck在2014年的日本横滨世界大会。

Ulrich Beck 对于世界主义的信念是重要的，虽然他没有特别理论化这个问题，但是他是个世界主义者。或许这让一个日本-法国-加拿大的社会学家撰文来纪念是适合的。我之前对于 Beck 的作品就很熟悉，不过要到了 2005 年左右他来到 Toronto 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他。我记得他对于这个城市拥抱现代主义建筑的高度惊奇，特别是芬兰建筑师 Viljo Revell 所设计的 City Hall，而他对于族群文化的多元主意也感到兴趣，Toronto 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适合研究这个问题的地方。当然，这些主题也都是 Beck 的中心关怀，所以我们谈论和走在路上的时候，对他来说，反身现代性和世界主义都是实际的日常生活问题。

要评价 Beck 在北美的影响，我想我们需要区分三个北美的社会学边界。首先他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法语区的魁北克社会学。不意外的是，Beck 的欧洲思考与历史渊源，许多他的概念都是魁北克社会学家的参照点，因为这些社会学家也都运用像是风险社会或是反身现代性的概念在关

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著作之中 (Michel Freitag, Joseph Yvon Thériault)、个体化的作品 (Daniel Dagenais)，以及 Beck 对于世界主义在泛北美的跨文化实践 (Jean-François Côté)。事实上，魁北克社会学期刊 Sociologie et

Sociétés 有一期就是特别讨论世界主义，主要就是用 Beck 的作品作为起点。

第二个北美社会学社群就是英语区的加拿大社会学。这比较像是介于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和 Beck 的作品有所互动。虽然比起魁北克社会学，英语社群的程度比较少，但是他的作品还是可以在 3 个次领域中看见：监控社会学（安全管控政府和风险评估。David Lyon, Sean P. Hier, Daniel Béland）；环境社会学（制度化公共管理在地的风险问题，Harris Ali）；加拿大政治经济学（风险雇用，Leah Vosko）。

美国社会学是受到 Beck 影响最少的地方。当我们比较 Beck 的影响力在欧洲、亚洲、南美洲（见本期全球对话文章），美国例外主义特别明显。或许用美国的经验主

>>

义和欧洲的理论主义来解释是合理的，但是有更多其他的因素。从制度的角度来看，Beck 没有美国的何作者让他的概念可以在美国社群内流通 (Michigan, Wisconsin, Chicago, Berkeley, Harvar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此外，Beck 不长撰写分析性的文章，比较倾向写短文，并且透过这样的方可以快速响应变迁快速的学术界。所以，他的概念不是可以马上被研究所操作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他在美国的低能见度和 Zygmunt Bauman 一样。这和 Bourdieu 受到欢迎的程度差很多。此外，利用 Burawoy 的分类，Beck 是个公共社会学家，所以和美国以专业社会学为主流的架构不太兼容。所以他最近对于 Angela Merkel 的批判 (Merkiavelli) 在美国是没有什么人知道的，不过他的公共实践模式在美国已有其他的公共或政策社会学家是持续在诉求的 (Burawoy, Orlando Patterson, Michèle Lamont)。

同一时间，Beck 的影响可以在一些美国社会学的次领域中看到，包括 Jeffrey C. Alexander, Craig Calhoun, 和 Saskia Sassen。他们都和 Beck 的作品有所对话，而风险社会的概念也变成美国环境社会学的主要概念，也是 STS 的核心概念之一（特别是那些研究组织管例和政策风险的人）。有趣的是，Beck 的方法论世界主义诉求也被美国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分析所注意，还有世界体系理论家、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文明化和帝国的学者，多场域的民族志学者，政治社会学家等等也有注意到。

关于 Beck 的贡献，我想我可以用四个研究主题来说营。第一是全球风险的快速循环所带来的社会与政治意含。这包括了理解高度选择的过程，而组织在象征上颌政治上也包括了许多风险，像是恐怖主义，并且忽略其他的风险，像是贫穷和结构暴力。第二，我们应该定位全球社会力量的影响，不论分析的层次为何，都要问题化「社会」这个客观研究的对象。第三，我们应该试着去厘清行动者和制度的功能，特是那些倾向平等和多元文化的集体计划，对世界主义的包容等，可是也要理解反世

界主义。第四，我们应该发展出

种数据收集和方法的工具，不要把国家当作分析的默认单位，以及为了比较超民族国家和次民族国家的现象、行动者、制度，这个努力更加需要被重视。Beck 的确有这样的研究议程和架构。

上一次我见到 Beck 是在 2014 年的 12 月，那时候我是参加一个 Paris 的工作坊，关于世界主义的资料和研究方法。他谈到他的书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World* 时，充满热情与活力。他把这本书当作是里程碑的作品，论证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视野，并且可以用来理解这个复杂多变得世界。这是他最后的想法，也是最重要的属于他的大图像的知识创意。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和一位朋友在一个小餐厅 (bristo) 吃饭，是一种在 Paris 快速消失的餐厅。我要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他和他的太太，也是有名的社会学家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走在路上。想必他们也在这边用餐吧。我看着他们鹣鲽情深的在夜晚的 Paris 手牵手，在夜晚的 Paris。这就是我最后的印象。他的过世，不但是社会学界，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界的一大损失。■

來信寄給 Fuyuki Kurasawa <kurasawa@yorku.ca>

> 爱尔兰迈向经济危机的路径

by Rebecca Chiyoko King-O'ria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 爱尔兰

1990年代，爱尔兰被世界认为是成长快速的「Celtic 老虎」。大量的出口和外国投资总是报纸头条的焦点，但是真实的故事是大量的失业和人口外移。1990年代起飞的尾声，爱尔兰社会有令人无法想象的资源，包括经济、制度、文化。爱尔兰经济稳定下来了，发展足够了，而1980年代所留下的债也还清了。

2008年之前，那些资源仿佛烟消云散了，伴随金融危机一起消失无踪。1990年代的自由全球经济在最肆无忌惮的时候被转变成谨慎的资本主义小尾巴。

什么造成了这样的转变？现代资本主义的三个要素：金融化、国际整合、自由贸易政策，三者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爱尔兰的危机。第一，1990年代的起飞是以制造业投资为基础，并透过发展主义国家支持新工业而得以可能，可是2000年之后却看到资产的投机操作，随着廉价的信用和炒作居住和办公建筑的市场，产生了房地产泡沫。最后，这也导致了银行破产，银行债务被转嫁到公众身上。

第二，爱尔兰的金融化已经到达危险的高峰了，藉由改变欧洲整合的动态而更加危险。1990年代，欧洲的公共基金支持了高比例的爱尔兰投资；2000年代，私人借贷的大量流入笼罩了整个经济体，爱尔兰银行变成大量欠债给国际银行。政策方面，欧盟推动金融整合，包括欧元整合货币的实行，甚至许多国家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减低了社会和资本的投资。当欧洲大量投资给未来，结果就是投机。

第三，爱尔兰的政治帮助了国际金融化的压力转进到国内的危机。90年代末期的政府结合了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种危险的混合体取消了所有的税，变成更依赖资产利得税，好因应支出的增加。当信用和房地产泡沫在2008爆发之后，爱尔兰的公共基金留下了一个大洞，而为了响应这个危机，政府马上增税，

减少支出。

爱尔兰的故事提供了几个重要的课题，这些课题事实上是关于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总是和北美的自由资本主义放在一起，而爱尔兰经验某些方面也是类似的。为了增加投资而减少资本利得税和减税的作法，依赖于股票市场去提供检查，坚持轻微的银行管制和限制国家去取得银行活动的信息，所有这样市场机制都导致了爱尔兰的灾难的发生。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高度集中化的政府系统让几个部门有很大的权力，所以限缩了看待经济的视野，减弱民主治理。导致投机泡沫的财务政策和削减税基是后来撙节的原因。注重在现金支付而非公共服务的福利国家侵蚀了公众对于保护社会服务的支持。所有这样都是政治的因素，并且影响深远。但是每一个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北美自由经济倾向拥有更层级化的公共和私人组织，并且给予政党更多的权力。他们倾向预算赤字，强调所得的利益而非公共服务。这些特征或许不是市场的面向，可是却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并且是自由主义的共同元素。

这场危机的6年多之后，爱尔兰的经济现在很脆弱，而且复苏得不平均。特别是就业提高了，税收提高了，而且预算赤字减少了。但是，爱尔兰向前进的能力被之前所提到的三个潮流所威胁着。虽然银行没有像以前一样随便借贷，但是却提供了更少的信用给企业，政府也成立了长期保证的国家投资银行。金融和资产都成长了，所以提高的租金和价格给予了家庭和中小企业不小的压力。

随着这个浮现的再次金融化，欧元区的政策回应很不适当。或许欧盟领导者的撙节政策并不令人惊讶，欧洲的社会民主国家历史上也不喜欢预算赤字和国际金融市场。可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国家持续拒绝平衡支出削减和投资计划去刺激成长与增进社会福祉。现在的投资



「欧洲曾经相当努力投资未来，
但是现在只用想的而已」

社会契约。这些都在保护式的金融外壳之内。爱尔兰和欧洲的方式强调不只在外壳，还包括了极少的社会保护。重新找回古老的社会民主保护措施，包括审慎、保护、经济社会的生产活动等，这是长期被欧盟政策辩论所忽视的，也已经过期很久了。■

來信寄給 Seán Ó Riain <Sean.ORiain@nuim.ie>

计划透过公共部门，在新的「量化宽松」下是不被重视的。钱都进了私部门的口袋。

最后，爱尔兰的现在政府急着想要减税，这种受到欢迎的政策并不令人意外。可是这带来了对于反对现有欧盟和爱尔兰撙节政策之势力的重大挑战。相反的，平衡预算还没有成为欧洲经济自由派的策略，但已经是社会派的了。他们已经寻找社会团结的可能，制定一个以高就业、强大社会服务、平等工资为基础的

> 保卫公共领域

by Mary P. Corcor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 爱尔兰



新公民社会的象征：Dublin郊区的小区农田。Mary Corcoran摄影。

自由民主国家的公共领域，像是公共的资源、服务、教育、媒体等等，在爱尔兰看到了衰退的迹象。在同一时间，我称之为夹缝中的公共领域则正在兴起，也就是那些一般来说看不见的活动。这特别是在撙节政策之后产生的。我想是有可能去可视化这样的现象，以其描述这样的夹缝公共领域怎么传播到制度性的公共领域，迫使市场、国家、公民社会的关系重新平衡。

正式公共领域已经撤退许久了，包括资源的撤除和批评的声浪。这是30年来私人影响和公共挥霍的结果(借用J.K. Galbraith的话)。健

康服务的提供者，教育者、公共服务提供商都是私人部门、政治人物、媒体等所批评的一部分。Anthony Cawley对于媒体描述公共领域之框架的分析指出，公共领域被连结到「浪费」、「负担」、「支出」等概念上，而私人领域总是和「投资」、「财富创造」等连结在一起。这些连结几乎已经被内化了。

而在迈向经济危机的那几年里面，爱尔兰重新结构化了金融和市场体系。这并不是因为公共财和服务已经被侵蚀了。公共知识分子觉得越来越困难去构筑一个批判的空间。有修人已经宣称公共知识分子不够努力，

>>

对于市场基本教义派不够批判。这些知识分子觉得好像只是技术官僚的附属品，声音都不被注意和听见。

在天主教的巨大影响之下的技术官僚的政府相比，公民社会只有很孱弱的力量，至少和其他的欧洲社会比较起来是如此。爱尔兰在国家之外有力的机构很少，所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机会相对少。

可是，危机也可以是转机。爱尔兰已经历经经济衰退、政治挥发、社会心理的年代。我们「失去了蓝图」以及「失去了我们自己」，还以失去经济的主权。可是我们也便得更坚韧和有想象力，因为看到了许多新的小型公共领域。这里我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参与中看到公民社会的生命力和活力。即使只是检视日常生活的样貌，夹缝的公共领域显示出了潜力，这种由下而上，被公民行动和互动所滋养的文化，正在茁壮中。

生产空间，像是都市田园，交换场所，农民市集等也正在都市中展开，挑战了大众消费的模式，重新链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让环境永续的议题被看见。公共图书馆也扮演了21世纪公共领域中的重要角色，镶嵌在地文化中，提供服务给移民

或是居民。一位资深的警察认为在Dublin最有整合性的空间就是新的West Dublin图书馆。

此外，有也许多以活动为基础的空间帮助活化了公共领域。像是年度的游泳、马拉松、公共沐浴等，也都是对所有人开放，提供机会给人们自我展演。700多个活动有赖于大众的志愿帮忙，在地的支持，提供艺术、食物、历史、音乐、文化、诗歌等的资源！

夹缝的空间也包括了临时艺术走廊、商店、表演等等，这样即兴创作的模式让公共领域活化了，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许多的预设。虚拟的空间也透过计算机和网络通讯媒介得以运作，提供了政治组织的机会，以及创业资金的募集，还有创意公共财的提供。

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是一个志愿性的组织，他们寻求建构绿化郊区和通勤乡镇的社群，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公共认同的形成上。民主参与的空间包括了多元的创意，像是「构想未来」就是一个公民团体，研究怎么达到更平等、包容、永续的爱尔兰国度。Men's Shed project提供了聚会的场所，让老人可以聚集、制作手工艺、

享受休闲时光。这些空间都构成了公民社会的活力和爱尔兰公共领域的基础，由下而上，让公民知道除了经济之外还有其他的公共生活面向。这也是社会。因为这样的夹缝公共领域的扩散，可以重新掌握制度的公共领域，并且成为更新这个共和国计划的一部分。■

來信寄給Mary Corcoran <Mary.Corcoran@nuim.ie>

> 爱尔兰的女性运动

by Pauline Culle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 爱尔兰



第一波的爱尔兰女性运动包括了Cumann na mBan：女性的共和议会组织，在1916年的Easter Uprising中对抗英国统治。

爱 尔兰有着很长的父权历史，但是也有持续发展的女性运动。今天复杂和跨国的女性主义可以在殖民时期找到其先行者。第一波的爱尔兰女性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以其1918的女性投票权设立，那时还是英国殖民时代。第一波的女性主义运动在民族运动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的要求被搁置一旁，特别是在保守的天主要后殖民时代的国家建立时期。在1970年代，第二波的女性主义标示了一个重要的

激进与巩固的转折点，在对抗施加于女性的暴力和生产权上面，大有斩获。相反的是，1980年代，正值社会保守主义高涨，高失业率，人民出走，这是对女性运动的反动。宪法禁止离婚和堕胎。

而1990年代则带来了女性主义的行动风潮，特别是女性主义的去中心化和分裂化，成为了网络和地方的社群与自愿群体。然而，离婚的合法化，同志的去歧视，以及越来越多女性劳动力参与，这些都是女性运动发挥作用的证明。在这段期

>>

间，女性主义者成功地公开检视取多污名的议题，并且保障了国家对于平等，避孕，资助女性社会服务等的支持。在1990年代则是生产权的立法，透过欧洲法庭得以成功，不过结果是有待评估的。这个第三波的女性运动越来越专业化，并且成为了国家女性主义的主流。

最近，为了响应经济危机，Catholic Right的运动复苏了，然后国家领导的撙节政策和新的团体也出现。爱尔兰女性主义网络(IFN)成立于2010年，目标是去动员年轻女性。Pro-choice的团体继续动员支持生产权，这是持续影响了好几世代女性主义的议题。而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女性的集体资源和能动性，这我们在许多的性别平等单位和公共服务的资金缩减可以看到。显然，撙节政策伤害了性别平等的基础，但是也有很强的女性运动动员反对这个潮流，包括了许多的抗议活动。

虽然全球化的力量，像是经济萧条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毫无疑问地对于女性主义运动有所影响，可是国际的力量对于爱尔兰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有待辩论的议题。许多学者看到了女性主义运动本土发展的一面，而其他学者则看到了国际影响的一面。欧盟则是爱尔兰关于性别平等辩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对于欧盟现代化影响离婚和堕胎的保守反动兴起，可是欧盟的性别平等和人权法庭的努力也开启了女性主义倡议平等的机会大门。另外一方面，的确，爱尔兰国内的女性主义运动也至关重要。爱尔兰性别平等政策的欧洲化和显著的进步也透过抗议、游说、立法等达成。2014年有超过30个性别平等的立法通过，都和欧盟有关。而欧盟也提供了这些团体机会去跨国合作，形成泛欧的女性团体网络，像是European Women's Lobby。

可是，欧盟并不是性别平等的万灵丹。

爱尔兰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还是存在，在欧盟的层次，性别平等仍然是在工资的议题上。或许可以说，欧盟对于爱尔兰性别平等的支持较过去少了，因为在国家和欧盟的层次，去歧视的努力已经相当普及。相同地，新自由主义对于个体权利的重视和组织效率也提供了不少的支持，减少了不平等，可是也为女性带来了新的问题。女性「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劳动参与的增加被认为是成功的进步，可是社会生产、照顾、结构化歧视，权力不平等还是一样，并没有改变。

在欧盟之外，爱尔兰的女性运动一直以来想要透过联合国对政府施压，包括了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和北京纲领。2014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的报告指出爱尔兰需要更强大的性别平等与女性参与的努力。

爱尔兰在政治、经济、公共领域的代表性还是很低，这些包括了年长的政治和经济领导者，这需要彻底改变我们这个父权文化的结构。爱尔兰的女性主义运动是复杂、不同的。但是他们可以投身到各个领域，无论是社会、文化、政治。也在不同的层次发生影响力，像是地方、全国、跨国的层次。女性运动即使复杂，但是仍然对于实现性别平等来说，是重要的。■

來信寄給Pauline Cullen <Pauline.Cullen@nuim.ie>

> Celtic 连结

爱尔兰的全球家庭

by Rebecca Chiyoko King-O' Ria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 爱尔兰



爱 尔兰过去有许多人民出走，但是现在却是一个全球化的国度，特别是 90 年代和 2000 年之后的移民潮。和许多人的期待相反的是，并非所有的移民在 2008 的经济危机时期回到家乡波兰或是其他国家，反之，许多人留下来了，组成家庭，特别是高教育的人口，带来了全球化的经验，非爱尔兰的配偶，小孩，网络。所有这样都让爱尔兰逐渐成为了全球化中心。

2011 年之前，爱尔兰的人口普查显示有 17% 的人口非出生在爱尔兰。这相较于 2006 年成长了 25%。而 2011 年的数据也显示有 12% 没有爱尔兰国籍。虽然也有 85% 的人口是白人和爱尔兰籍，2006 到 2011 年其也有 87% 人口成长，包括非中国的亚裔人口（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主要都在 40 岁以下。而超过 50 万的人口

爱尔兰充满了全球化的爱。

(514,068/4.5 百万) 说外语，而最多的是波兰，再来法语、立陶宛语、德语。在这些人口结构变化的上层，科技也让跨国的实践成为可能。宽带和无限网络的普及率让 81% 的人口可以上网 (2012)，而在 2008 年只有 61%。

这些频繁的接触和跨国的亲密关系增加意味着什么呢？

家庭—各种形式的家庭—现在正在各种制度的交会口，形塑着整个爱情和亲密关系的文化理解，决定了亲密关系的合理形式。这些理解通常透过情感行为的剧目而产生，而这些跨国的家庭和情感实践也成为爱尔兰日常生活的核心。我们从 2011 年的普查可以知道有许多混合或非爱尔兰的家庭存在。这可能是包括了出生在爱尔兰的小孩和其奈及利亚的移民父母住在一起，也可能是其他国籍的家庭组成。有些

>>

族群特别会组成这种混合家庭，包括美国 (72%)、英国 (64%)、奈及利亚 (77%)。

而随着增加的族群多元、混合家庭、家庭型态的多元，爱尔兰经历了家庭为基础的多元文化变迁，也是 Ulrich Beck 所说的全球家庭。这些家庭通常是多族群、多文化、多信仰、多语的，透过网络媒介和爱尔兰以外的世界进行连结。29% 的爱尔兰网络用户于 2012 年的调查中显示用过视频会议来维护情感和社会的支持。

而这样的多元全球家庭怎么和爱尔兰以外的世界进行连结呢？如上面已经提到过了，主要的连结并不是经济为基础的，而是情感和文化，透过信息科技来维系。像是 Skype 等的软件可以让爱尔兰的家庭进行跨国连结，超越地理的限制。这也形塑了人们如何利用科技进行情感维系的方式。Elliot 和 Urry 认为科技的使用让人们把情感「储存」到科技之中，然后再「提款」出来。「个体可以被看作是在进行情感银行的处理，先把情感、情绪储存起来，往后再拿出来进行处理」(Elliott and Urry, *Mobile Lives*, 2010: 39)。如情感银行的概念，我也称之为「情绪串流」，亦即透过信息科技来沟通传递情感。

Skype 视讯不只是有声音和影像的沟通媒介、人们坐在计算机前面视讯这样而已，它更像是「串流」许多影片和影像，然后

透过「窗口」去捕捉串流的当下，把日常生活的噪声和混乱都记录下来，不是只有几分钟而已，而是几小时。透过每日的视讯，有时可能是好几天，将彼此的社会关系稳定下来，创造一种情感连带，超越时空的限制。这种情感互动让长距离的互动成为可能。

爱尔兰的家庭变迁不只是人口组成上的变化，还是地理限制的超越。有了科技，爱尔兰的家庭生活有了改变，越来越多人可以进行全球化连结，并维系情感和亲密关系。■

來信寄給 Rebecca King-O' Riain <Rebecca.king-oriain@nuim.ie>